

吴晓蓉◎著

WAITUI

YU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批准号:04CMZ006)

NEISHENG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外推与内生

西南民族地区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

XINAN MINZU DIQU
JINGJI SHENGCHAN FANGSHI ZHUANXING
YU SHEHUI WENHUA BIANQI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外推与内生

西南民族地区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

吴晓蓉◎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批准号: 04CMZ006)

WAITUI YU NEISHENG
XINAN MINZU DIQU
JINGJI SHENGCHAN FANGSHI ZHUANXING
YU SHEHUI WENHUA BIANQIAN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桂 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推与内生：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 / 吴晓蓉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633-9841-6

I. 外… II. 吴… III. ①民族地区—生产方式—研究—西南地区②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F127.7②K2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908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1)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15.75 字数：270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1.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晓蓉新作,《外推与内生: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即将出版,托我写序。审其题,阅其文,知其立论于如何把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由外推转向内生,从而构筑一个良性发展平台,这是一个转型研究,不容易。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是个广义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大西南涵盖了川、滇、桂、渝、黔、藏6省、市、区,总面积达270万平方千米,几乎相当于我国总面积的1/4。西南民族地区不仅是一地理位置特殊、范围复杂的地域系统,也是一与东部沿海地区及内地有较大差异的特殊类型区域,其从自然、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表明了自身特性。

中国地理的突出特征为西高东低。西高主要表现为山高成系,又因高山而有大江、大河。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横断山等巨大山系构成了西部山地的主体,这些山,大多终年积雪,替人类储存了许多雪峰冰川。这些固体的水库,将随季节变化,继而出现江河奔腾而下的壮观景象。长江、黄河、珠江等纵贯中国南北、东西的几大水系皆发源于青藏、云贵高原。由澜沧江而有越南的湄公河,由怒江而有缅甸的萨尔温江,由雅鲁藏布江而有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

这块广袤的土地,地形地貌极为复杂。仅以云南为例,从梅里雪山(海拔6700米)到河口(海拔70米),从北往南,每千米下降200米,

整个地形垂直下降，相当典型。故而在西南地区，从岩溶地貌到河谷平坝，各种类型齐全，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地形地貌的垂直变化决定了西南地区气候呈垂直差异，如此的气候变化，又决定了植物群落和动物群落呈现立体分布状态。这种立体的地貌、立体的气候以及立体的动植物分布状态，又决定了西南众多民族以不同的适应自然环境的方式为基础的不同的文化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各种发展阶段的文化类型（或社会形态类型），就这样如此丰富地呈阶梯状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

从“世界屋脊”到北部湾，阶梯状的天、地系统，决定了“大分散、小聚居”，民族构成（36个民族，占全国民族2/3）的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原始到现代的巨大反差性，举世无双的自然、人文系统决定了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的双重性：经济的滞后与文化的丰富。前者制约西南及21世纪的我国发展，影响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祖国统一；后者既是中华文化构成和恢弘的重要资源，又关乎全球化呈加剧态势之际民族认同基础的强化。

历史上的西部大开发、开发大西南并非没有成就，而外推式发展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现在大力推进的西部开发在认识上并未走出这一误区。以前的发展有特色，即以借助现代高科技不断创新拓展的特色经济优势，并未形成真正的优势，即便谈“优势”，谈的也是“资源优势”、“边贸优势”、“旅游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均是低水平的、粗放型的、以工业社会发展为参照系的发展观。“西电东送”、“南水北引”等以开发西南资源为定位的开发，同样存在很大问题。尽管其有合理性，但未从西南实际出发，导致许多问题的出现与滋生。如，滇池水被破坏后，政府在治理方面投入巨大，但至今不仅未带来好转，甚至呈变本加厉之势。密集的水库建设，化工、重工开发导致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竭泽而渔的开发，显然没有顾及环境和生态的保护和再生。

如此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便迫使我们在不得不面对这些几乎是整个中华民族大动脉的河流、诸多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河流发源于中国大西南这一事实之际，须慎言开发。倘胡乱开发，其灾难不仅仅是全中国的，也是全球的。这绝非危言耸听。目前西南仅以效益和速度为圭臬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破坏自然、人文资源的富集优势，使自然、

人文资源受到践踏。关于此,该书有较为翔实的调查和描述。

而要实现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须有个由外推转为内生的过程。典型的“内生”,则是“传统的”。而“传统的”即是西南诸民族在与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长期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适应这一系统的智慧结晶。它与西南文化变迁互为补充;与民族信仰、习俗等融为一体;并与当地教育形成良性循环;有利于地区资源的利用且不乏后继力;有利于生态平衡,减少污染;有利于经济结构整体改善。本书中,晓蓉针对上述问题,通过长期、大面积的,对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现状的实地调查,对其存在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与环境、未来发展趋势等做了详尽研究,并据此提出良性发展西南、发展西南经济与文化的对策。该努力,值得赞许。

在西南,要形成外推与内生的良性发展模式固然非本书所能为,但只要认识到某种发展不可持续,须探寻良性发展的思考者越多,努力越多,就会逐渐生成一个外推与内生、国家与西南、经济与文化良性发展的理念和模式。

倘如此,作者的研究与执著便得到了报偿,写此序的初衷也便得到了报偿。

张诗亚谨识
己丑年岁暮于說乎斋

前言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究竟能带给人类什么呢？无独有偶，2007年，我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知识的“能”与“不能”》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能为人类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它们能否增进人类社会的福利并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和自由”的追问。翁乃群先生也提出把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并力求形成文化产业的希冀。显然，对社会学研究价值的追问已成为一些研究者的价值诉求，这也是我个人学术工作的起点。

大自然动态平衡、良性循环的整体生态活动圈，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自控制、自调节、自发展的结构。在该结构中，任何物种的生态活动都要服从整体稳态发展的系统规律与目的。如果某一物种的生态活动影响整体的动态有序，造成生态圈的震荡，其将为整体所调节。人类是大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是大自然生态圈发展到高级阶段后形成的理性调节源。人类的理性调节，属于并服从于大自然生态系统的自调节机制。这样，人类的生态活动，作为大自然生态活动圈良性循环的一个要素与环节，对整体的有序发展，应发挥更为积极与自觉的作用。对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注反映出：当西方发达国家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转向，西方社会学者、文化学者和人类学者对其相关问题予以关注的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在国家转型过程中重视民族地区的

经济与文化发展,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本书以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为理论基点,从具体案例出发,通过对西南以某种经济生产方式为主的民族及地区的考察,揭示了其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之型的转变过程、转变中出现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与环境、未来趋势等。本书还针对西南民族地区发展中存在的地域限制较大、产业结构单一、科学技术发展相对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政府引导乏力、文化变迁的非均衡性、文化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被打破、文化约束力减弱、民族文化资本化运作等问题提出:既然发展经济、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和社会文化变迁是西南民族地区人们无法规避的时代议题,那么,谋取民族文化与经济的“非零和”状态,借此达致双方受益的和谐共生状态,是西南民族地区,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应全面观照的重要议题。而要实现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须有由外推转为内生的过程。

西南民族地区自然、人文生态极为复杂,远非本书涉及的几个民族所能囊括。尽管本研究在调查对象及研究范围上摆脱了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推理的研究范式,也摆脱了调查研究中散点或漫天撒网式调研的随意性,力求从整体层面上把握,既有对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情况的普遍了解,同时也有对具体点的洞察,即个别案例的深入考察;但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属于调查面广、涉及学科多、关涉问题复杂的课题,加之本研究为此进行的田野考察尚属初步,必然会限制理论思考的深度与广度。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本研究也因诸多关系、诸多限制而无法达致“完全之美”。

在研究过程中,心中始终萦绕着对那些给我真诚帮助之人的盈盈谢意。感谢调查期间足迹所到之处的人们,谢谢你们为我展开的人文世界和明朗胸怀,谢谢你们对访谈问题的直言不讳与生活中的无遮无掩。感谢恩师张诗亚先生在书稿写作过程中的指点迷津以及为本书作的见解深刻、充满大师睿智远见的“序言”。感谢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孙杰远先生,谢谢你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与智慧。感谢我的研究生张冀、阳朝、白芳丽、罗建生、王江华、姜运隆和王培等,

谢谢你们在调查和研究期间对我的照顾、支持与帮助。感谢那些研究西南、研究西南民族地区、研究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的诸多先贤哲士们,你们的先行研究,为本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研究视角、研究素材、研究资料和研究数据。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们,谢谢你们给予我深度探究该问题的机会与条件、对该研究的充分肯定与认同以及赋予我的使该书面世的责任。感谢西南大学社科处吕刚武老师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所有专家。

费尔南·布罗代尔说:“一个文明既不是某种特定的经济,也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而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但愿我们研究的文明、我们文明的研究能经受岁月的荡涤。

目录

导论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理论构思	7
三、实地调查	11
第一章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概述	17
第一节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	17
一、何谓经济生产方式转型	18
二、经济生产方式界说及分“型”	23
三、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类型	27
第二节 社会文化变迁	34
一、何谓社会文化变迁	35
二、社会文化界说及分“型”	39
三、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类型	40

第三节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关系	48
一、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引发社会文化变迁	48
二、社会文化变迁催生经济生产方式转型	52

第二章 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和社会文化变迁实地调查

60

第一节 以西藏米林县琼林村珞巴族为例	60
一、米林县琼林村珞巴族概况	60
二、琼林村现代农业的发展	62
三、以文化符号变化为载体的社会文化变迁	68

第二节 以云南永宁乡落水村摩梭人为例	70
一、永宁乡落水村摩梭人概况	70
二、从农牧经济向生态旅游经济的转变	73
三、落水村摩梭人传统社会文化的嬗变	77

第三节 以四川白马乡祥术加寨子白马藏人为例	80
一、白马乡祥术加寨子白马藏人概况	80
二、农牧业与生态型经济兼容发展	82
三、传统文化式微	87

第三章 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90

第一节 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中的现实问题	90
一、地域限制较大	91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94
三、科学技术发展滞后	98
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100

五、政府引导乏力	105
第二节 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现实问题	107
一、文化变迁的非均衡性	108
二、文化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被打破	111
三、文化约束力减弱	114
四、民族文化资本化运作	118
第四章 问题滋生的原因与环境	122
第一节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中问题滋生的原因与环境	122
一、现代性	123
二、内发性	126
三、多样性	128
四、跨越性	130
第二节 社会文化变迁中问题滋生的原因与环境	132
一、文化变迁的共生性	133
二、文化变迁的内发性	136
三、文化变迁的多层次性	138
第五章 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趋势	141
第一节 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趋势	141
一、多元一体化倾向	141
二、市场化倾向	143
三、影响扩大化倾向	145
第二节 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趋势	146
一、乡土社会结构逐步式微	146

二、民族传统文化资本化倾向	149
三、从多元走向融合	151

第六章 由外推转向内生:良性发展对策研究

第一节 促进和谐人文,建立文化生态补偿系统

一、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护与传习	154
二、以文化位育为要,培养民族成员文化自觉意识	158
三、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强化民族文化认同	165
四、制定并实施文化保护主义政策	182

第二节 契合西南民族区域特点,发展生态工农业和旅游业

一、契合西南区域特征,发展特色农业	187
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189
三、发展特色产业,做好“三农”工作	191
四、遵西南传统,合理利用优势资源	192
五、发展生态旅游	194

第三节 切实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督导职能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倾斜	200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发展“硬环境”	201
三、制定生态环境政策,增加环保投入	202

第四节 优先发展民族教育,开发人力资源

一、西南民族地区人力资源与教育概况	203
二、优先发展民族地区教育的必要性	205
三、发展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对策	208

参考文献

导 论

一、研究背景

(一)对西部开发的理性思考^①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东、中、西的经济格局划分及其派生的“梯度理论”与“反梯度理论”的激烈争论,使区域性研究再度构成理论研究的重点并上升到关系国家重大决策的程度,西部大开发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这一方面源于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而被称为之人类文明“基因库”;另一方面则因能从西部传统和文化中,寻得现代文明极为珍视的生物多样化、环保等价值观的内在支持,其中尤以西南为甚。基于此,从中央到地方都一致认为:西部开发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但在具体实践中,可能因牵涉多方利益形成的发展季风的横扫,使可持续发展成为空谈,从而造成西部,尤其西南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的极大破坏。因此也可以说,西部开发对西部人而言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举措。西部各民族因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轨迹和其所处的独特生态环境,既是构成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又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所有特点和文化遗产模式。各民族依其不同生态环境和发展水平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其开发也应在不同文化模式基础上形成不同的形态。探究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是思考、权衡西部开发方略与模式所必需的。

(二)经济发展呼唤理性反思

100 多年以前,李鸿章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他所处的那个时

^① 吴晓蓉:《教育,在仪式中进行——摩梭人成年礼的教育人类学分析》,3 页,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代,在今天,若套用他这句话来形容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想来也不为过。因为,今日社会结构在变化的深度、广度与速度上,与那时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这该与20世纪初大举入侵且势如破竹的西方经济有关。该经济形态的进入,表面看来只破坏了沿海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似乎未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耕经济、家族村落等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带来冲击或突变。即或是1949~1980年的经济生产方式,也未能为中国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民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在某些方面呈现出退步或停滞趋势,亦即这种“外烁式”的发展,未能催生我国,尤其是西南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发生转型或变迁。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则因其“内发式”的发展需求与实际行动而突飞猛进。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先是“市场”含羞带怯地悄然出现,然后是市场运用自身力量对“计划”、“公有”等的包围与蚕食,最后,则是市场依据自身力量跨越经济边界,迅速蔓延、渗透至整个社会机体^①。

1980年至今,历时已30载,在这既短且长的时间段里,市场发挥着巨大作用,其在使人们享受丰富物质资源、享受经济加速发展快感的同时,也让现代社会充满了危机,让人们深切体会稳定和安全感丧失的丧失。这意味着,“当快速的市场转型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所有社会安全网时,其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②,这也是为何在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同时,人们逐渐意识到不稳定因素也在日益增加,使政府和个人都面临各种危机。“在这个背景下,保护性的反向运动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政府的决策者逐渐认识到,市场只能是提高人们福祉的手段,而不能本末倒置把手段当作目的来追求。市场是必须的,但市场必须是‘嵌入’社会之中,国家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不能允许、也不可能出现一种‘脱嵌’”^③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说,市场力量的扩张或

①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1),148页。

②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1),148页。

③ “嵌入”(disembedding)和“脱嵌”(embedded)这两个术语,是由西方经济学者提出。前者指人类经济是嵌入政治、宗教、社会关系之中的,因为经济活动从属于社会。后者基于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试图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并让社会运转从属于市场的“乌托邦”经济模式,因为事实证明,经济是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的。19世纪以来的双向运动即是明证(参见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1),129~130页)。

早或晚会引发旨在保护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反向运动；而保护性立法与其他干预手段是这种反向运动的特征。^①

该观点虽是卡尔·波兰尼在60多年前提出的(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今日读来，依觉其直指当下。本研究虽不敢冒称什么反向运动，但在对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现状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其问题展开反思却是存在的。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坚持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采取各种有力、有效措施推动我国整体或局部区域的经济发展。但反观我国，尤其西南民族地区从80年代至今因强调“自然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强调经济“线性”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忽视、缺乏或很少关注民族“软实力”，即文化、宗教、人文等因素对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忽视经济在民族发展中的“非线性”作用以及“弹性经济秩序”的建立等原因，而出现环境、生态、文化等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极度破坏与失衡。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决策者不再着力于基本保障和平等，而是大讲‘发展是硬道理’，致力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其他一切都要让步，包括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当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一个‘下溢假设’(trickling down effect)相当盛行：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②。从今日现状来看，当时经济学者的美梦正逐渐或正在破灭，因为严重的环境、生态、社会、文化等各种问题正日益呈现。基于此，对经济发展的理性反思，不仅是西南发展之需，也是国家、社会发展之需。

(三)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热的关注

社会研究者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既是社会发展所必需，也是社会研究者之为社会研究者的职业操守和价值关怀。关于这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尽管我国的社会学是一门起源于西方，后由国人参与并发展起来的学科，但其在分析我国社会现实问题方面却发挥了巨大成效，对社会转型问题的研

①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1)，148页。

②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1)，131页。

究即属此类。这可能应归因于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1979)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学家用“社会转型”一词提纲挈领、高屋建瓴地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巨大变化做了概括,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何谓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社会转型不同的理论基础以及不同学派基于不同理论对社会转型做出的不同阐述和分析,并继而形成自身的分析框架,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未来学、政治学以及哲学等。另外,诸如教育学研究以社会转型为理论基础,试图借此反思教育和学校,诸如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宏观背景和思想领域的文化反思,对社会转型时期学校文化生态莅临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等。再诸如有学者认为,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化中最为明显和根本的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或曰“社会结构转型”。从宏观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的变化到微观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调整,无一不与社会结构转型这一社会事实密切相关。社会结构转型几乎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现实背景、理论前提和关注焦点;社会学的各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亦常常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论域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①

上述研究表明,不同的研究立场和视角,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理论以及相异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形成了有关社会转型研究的兴旺景象。这也引发了笔者对社会转型热议现象的关注,研究者们何以如此关心中国社会转型问题;中国社会转型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伴随社会转型有没有滋生其他的转型方式,诸如经济生产方式;该转型有无区域、民族差异;尤其是地域、民族、文化等自然、环境和人文都较为复杂的西南地区,有无因整个国家的社会转型而发生某种转型或导致某种变迁等。如果将其落实到西南和西南各民族,则可以表述为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有无出现转型,社会文化可否因经济生产方式转型而发生变迁,这两者有无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等。基于上述思考,在2004~2008年的时间段里,笔者相继深入川、滇、黔、渝的一些地方做了实地调查,答案是肯定的,这更坚定了笔者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四)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

近年来,伴随社会发展滋生系列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诸多问题,如,

^① 王建民:《社会转型中的象征二元结构:以农民工群体为中心的微观权力分析》,载《社会》,2008(2),77~78页。